



黨給魯迅以力量

河南省文聯籌委會出版

黨給魯迅以力量

★魯迅先生誕生七十周年紀念特輯★

編輯 河南省文聯編輯出版部

發行 新華書店河南分店

印刷 河南日報印刷廠

1951年11月再版

3,001—6,000

魯迅先生誕生七十周年紀念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與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着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澤東

目 錄

黨給魯迅以力量·····	馮雪峯
魯迅和瞿秋白同志·····	徐 崙
魯迅生平及他思想發展的梗概·····	馮雪峯
魯迅文藝思想的幾個重要方面·····	陳 涌
整風學習中讀魯迅·····	蕭 三
在欣慰下紀念·····	許廣平

黨給魯迅以力量

馮雪峯

——片斷回憶

我腦子裏時常浮動着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實際關係的一些回憶，我想我現在不妨就記下幾點來。

既然說是回憶，我就只能限於我所熟悉的一九二八年以後的事情。在這以前，魯迅先生當然和個別的共產黨員有過不少的接觸，例如在北京，當『五四』以後到一九二六年他離開北京以前的幾年之間，除了和他接近的青年裏面有共產黨員外，當時在北方的共產黨領袖——同時是最有權威的革命青年的導師李大釗同志，就是魯迅先生所熟識和很敬佩的人，雖然兩人之間的私人的來往並不怎樣密切，但他們是當時非常劇烈的革命思想鬥爭和學生運動中的戰友。

又如一九二七年在廣州，和他接近的青年幾乎全是共產黨員、共青团員和一般『左傾分子』。國民黨方面的青年，也有同他來接近的，可是，那大抵是派來偵察他的暗探。接着，國民黨背叛革命，瘋狂地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當時，魯迅先生都一一目睹，而且他自身也在危險中，他所受的刺激，是百倍地超過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在北京大屠殺愛國青年時所受的刺激的，這使

他對中國政治和革命前途開始了完全新的認識。

於是，魯迅先生開始認真地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國民黨叛變革命以後，我們的黨繼續不撓地領導着人民堅持鬥爭，使革命更深入地發展。在這新的形勢之下，魯迅先生在自己的思想上成就了偉大的躍進；從此，他堅決地站到工農階級方面來，緊緊的團結在我們黨的旗幟之下，爲着共產主義思想和我們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而奮鬥了。

魯迅先生真正和我們黨發生了經常的而且非常密切的關係，就在從這時開始的他的最後十年。在這最後的十年，魯迅先生毫無保留地承認我們黨是唯一能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到勝利的黨；這信念，魯迅先生不會有一分鐘動搖過，即使在革命遇到挫折，我們黨遇到十分困難的時候，例如紅軍主力退出江西而開始艱鉅的長征的時候，又如在全國我們地下黨到處遭到破壞而國民黨法西斯特務却特別囂張的時候。因此，在這最後十年，魯迅先生也就非常信任地接受我們黨對他的領導，承認我們黨是他應該和願意服從的唯一的領導者。由於馬列主義的真理，由於我們黨對人民的忠實和對革命的堅決，也由於魯迅先生自己爲人類真理和中國人民革命的鬥爭的堅決，以及他對我們黨的高度的誠懇態度，在他最後這十年，他就成爲我們黨在文化戰線上的一面偉大的旗幟了。

當然，魯迅先生和我們黨的非常密切的關係，最主要的可以說都很明顯地反映在他晚年的全部著作上面了。他晚年的著作最深刻和充分地反映着十年的人民革命鬥爭，其中也就明顯地反映着我們黨的領導所給他的思想上的影響。但是，達到了這種關係，當然就有實際的接觸和聯繫。魯迅先生沒有加入我們黨；主要的是他參加了我們黨所策動和領導的人民團體，經由在人民團體

中工作的個別黨員同他來往，一面把我們黨的意見傳達給他，一面向他請教，同他商量。同時，在和他接近而且取得了他相當深的友誼的青年中也有共產黨員，於是經過這種黨員的聯繫，也使他與我們黨的關係更容易地密切起來；例如我就是起這種作用的黨員之一。此外，跟我們黨的個別著名人物的友誼的接觸，也增加了黨和他之間的密切關係，例如他同瞿秋白同志的往來。

我是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開始和魯迅先生來往的，當時他並不知道我是共產黨員；而且當初我也並不是承受黨的意思去找他的。那時我初到上海，還沒有和黨的負責文藝上領導工作的同志接上關係；我當時發動編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翻譯叢書，也是我個人自動搞的，所以我就抱着同魯迅先生商量這叢書以及請他幫助我解決在翻譯上碰到的疑難的目的，由柔石介紹去見他的。但那時，我們黨已經有別的同志在和他來往，主要的是經過『革命互濟會』這一環。我就記得有一天，我去看他的時候，他剛送走一個客人，這樣，他開頭就談起這個客人來，說：『……革命互濟會的，來過三次了。人真老實，每次來都對我大講一通革命高潮。』說了，他就爽朗地笑起來，在善意的諷刺裏流露着對我們那位同志的愛。他到上海後不久，就和我們的革命互濟會發生了關係，捐過幾次錢。

說明了魯迅先生真有決心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來參加鬥爭的，是他參與了『中國自由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組織的發起人的時候開始的。這兩個都是毫不含糊地號召戰鬥的旗幟鮮明的革命組織。前者是純粹政治性的團體，鬥爭的綱領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爭取人民的言論出版結社等自由。後者是大家都知道的革命作家組織，目標是發動一個宣傳馬列主義思想，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為工農羣衆服務的革命文學運動。『中國自由大同盟』成立於

一九三〇年二月間，「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則成立在同年三月間；但兩者都在一九二九年年底就開始醞釀的。在上海的黨中央希望魯迅先生也做「中國自由大同盟」的發起人，派人來告訴我，要我先徵求魯迅先生的意見；我去和魯迅先生談了，記得他當時的表示是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一成立就會馬上被解散了，可是他又依然立刻答應參加並為發起人之一。以後是先由我介紹，黨又派人（我記得是派潘漢年同志）和他直接談過幾次。「中國自由大同盟」的成立大會是祕密開的，魯迅先生也出席了，我記得他沒有正式發言，可是精神很愉快，好像對於這種會他倒很感興趣，幾天之後他還談起那天開會時的情形。

「中國自由大同盟」很快就遭到了特別嚴重的壓迫，簡直無法活動，到五月間就等於自行解散了。但它的影響還是有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甚至聲言要捕殺它的發起人；魯迅先生就會經為此離開家到外面去避難過幾天。住在外面的幾天，他還是把地址告訴柔石和我，我們還是和平日一樣去看他，他也照常不停止工作——譯書和寫短文。我記得，例如，魯迅先生或許因此將流露消極或退避意思的那種顧慮，我們就從來也沒有過，因為他的態度不可能使我們存這種顧慮；譬如在當初他雖表示過意見，以為像「中國自由大同盟」那樣的鬥爭方式是不能持久的，但在為了參加它而受到反動政府恐嚇的時候，他可絲毫也沒有表示過他的受壓迫是因為我們鬥爭方式不好的緣故那樣的意思。鬥爭方式問題是任何時候都必須研究和得出教訓與經驗的，但一則對於這種問題，魯迅先生自己也缺少具體的經驗，並不怎樣有把握；二則在這種時候，他是把我們集體的戰鬥問題和國民黨對他本人的壓迫問題分開來看的，國民黨是即使你鬥爭方式很好也要壓迫你的，所以魯迅先生在別的時候固然常常提到關於鬥爭的方式和方法的種種意見，在受到壓迫的問題上

他可決不願意用別的理由去減輕國民黨反動政府應負的摧殘人權的責任。這種可貴的態度，在魯迅先生是始終很堅定的；這首先是由於魯迅先生對敵人的不妥協和對革命的堅決。

魯迅先生參加『中國自由大同盟』，在當時是相當震動社會的；在他本人，這也就是參加了一次實際戰鬥。因為他雖然只出席開了一次會，在宣言上面簽了一個名，但他是抱着嚴肅的態度和戰鬥的決心去參加的，同時這是他公開地宣佈他站在中國共產黨方面了。

但魯迅先生和我黨的密切的關係，主要是在我黨所領導的、以『左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爲主的革命文學運動中所結成的。

對『左聯』的組織，我們更多地聽從他的意見，同時要求於他的也更多些。譬如『中國自由大同盟』，我們只要求他列名於發起人中就够了，但『左聯』是希望他來號召和領導的。魯迅先生自己也完全不同，他對『左聯』是開頭就表示了積極和主動的態度。在成立之前，和他研究過多次，例如關於戰鬥綱領，吸收那些作家來做成立時的會員等問題，大部份都採取了他的意見，又如名稱中『左翼』兩個字是他認爲『加上去比較明白』而確定放上去的。成立大會上，他又針對着當時革命文學運動上非常實際的問題講了話，成爲後來對運動很重要的指示。

魯迅先生完全清楚『左聯』是我們黨所策動和直接領導的，而且我們還分明把『左聯』也當作直接政治鬥爭的團體，這一層他也明白，並且同意拿『左聯』去做直接政治宣傳的。我這裏不談到我們是否有錯誤的問題，也不談到魯迅先生是否也跟着我們而有錯誤的問題；我只是要證明魯迅先生是同我們在『左聯』以及在他魯迅的名義之下去進行政治宣傳，而且他自己也願意努力這樣做的。

但「左聯」主要的功績，也還是在思想鬥爭上盡了任務，而這大部份又得歸功於魯迅先生。魯迅先生以「左聯」爲自己的陣地而進行思想鬥爭，他就成爲不但非常積極，而且非常主動和靈活了。他曾經對我說過這樣的話：「弄政治宣傳，我到底不行的，但寫點雜文，我比較順手。」這是因爲那時（一九三〇年）我們曾經希望他寫些宣傳當時政治口號的文章，他才這樣說的。但他的這句話和他在雜文的精神上所表現，使我們感到：正是用他熟悉的工具，而且正是在思想鬥爭上，他是真正和人民的要求相一致，和我們黨相一致地在戰鬥着了。也正是在思想鬥爭上，他最顯出了對敵人的真正大無畏精神，同時注意着戰鬥的效果，講究着戰略和戰術。

總之，魯迅先生領導着「左聯」的那幾年，他自己是完全明白的：我們黨在支持他，而他在我們黨的旗幟之下戰鬥。

在這幾年中，我所看見魯迅先生在思想和精神上和我们黨的方向相一致，簡直達到了像一個很好的黨員那樣的地步。他把自己的戰鬥的文章戲稱爲「遵命文學」，同時嚴肅地解釋道：「不是遵別的命，是遵革命的命。」魯迅先生以革命的利益爲利益，一切都服從革命的利益，這是最根本的一點。不僅他的思想和文字上的戰鬥是服從革命的利益，而且他的實際行動和日常待人接物的態度也是如此的。在魯迅先生在世的日子，無論在我們黨這方面，在魯迅先生方面，都不會有過說出口來的明白的表示或相互的約束，說兩者之間的關係已經相當於黨和黨員的關係；但實際上的關係，是密切到黨和黨員之間的關係的。總之，早已經是親密的同志了，而越到後來就越親密。從我們黨方面看，我們每個同志都明白，魯迅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們的黨在影響他，領導他，支持而且愛護他。在魯迅先生方面，我想我們每個同志也都明白，他愛我們的黨，愛我們的

同志，認為這是他自己的黨，他服從它，擁護它，不是由於紀律，而是由於他對它的認識，他全身心地爲了它和它所領導的革命事業而奮鬥。

魯迅先生愛我們的黨，是由於對於我黨的認識，所以，他雖不是一個黨員，他的黨性却實在非常的強；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時也是最值得我們黨員學習的。他的思想上的黨性十分明白，首先是看他問題的那堅強的原則性——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而他的『分清敵友』、『黨同伐異』、『憎愛分明』、『愛自己的朋友』、『對敵人則到死也不寬恕』等等，都是他的強烈的黨性的表現。魯迅先生又是最反對自由主義的。不但他在思想上表現了他的強烈的黨性，在實際行爲以至日常小事也是和他思想一致的。例如他對朋友，如果某個朋友已經傾向於敵人，他就斷然絕交，毫不留戀。又例如在『左聯』中，他的戰友如被人詆譭，他是要毅然起而向詆譭者反擊的。而他就最厭惡那種聽見別人造謠詆譭自己的同志而也坦然處之，或甚至也跟着傳播謠言的人。他的這種表示，我是親眼見過多次的。我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當一九三六年六月間，最無恥的托派存心不良地寫一封信給他，在信中對斯大林同志和我黨中央大施攻擊的時候，他對托派的憤怒和憎惡真可謂到了極點了。他那時病在床上，我去看他，他還沒有對我說一句話，我也還沒有來得及坐下，他就忙著伸手向枕頭下面摸出那封信來，沉着臉遞給我，憤恨地說：『你看！可惡不可惡！』我看了後說：『他們自己碰上來，你迎頭給他們一棍罷！』他說：『等我病好一點的時候，我來寫一點。』可是，雖然決定要給以打擊了，而憤怒仍不稍減，又沉着臉說了一句：『可惡不可惡！』兩天之後他仍舊在沉重的病中，我就提議一個辦法，請他說個大意由我筆錄，寫幾句作公開信回答，他同意了。我主張早日答覆，是認為打擊托派固然重要，而同時也實在

爲了他可以早日減輕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這封回信在雜誌上發表了，他翻着那雜誌的時候是高興的；可是，過幾天我去看他時，他笑着說：『我們還是便宜了托派！他們的來信沒有比我的回信低兩格排，這樣，我們就把來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我們當時沒有注意，便宜了他們！』你看，從黨性出發，連這個由於我的疏忽所致的、看起來似乎很小的錯誤，他都指出來，而且提到原則性的意義上去。

同志們，魯迅先生不是一個黨員，他爲什麼黨性如此強，如此憎恨托派？就因爲他保護人民和革命的利益，因爲他愛我們的黨；因爲托派是最卑污的反革命派，因爲這些混蛋在他面前肆無忌憚地攻擊斯大林同志和我們黨中央，這是他無論在思想上在感情上都不能容忍的！

我認爲這是我們最應該學習魯迅先生的地方。

魯迅先生有一些思想和對問題的看法，特別是他前期的，我覺得是應該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原則與觀點，仔細的加以分析，才能成爲我們的營養的。但他大部份的思想，特別是後期的，我覺得都是正確的、革命的，我們應該學習的。而其中特別應該學習的，我以爲是他的黨性。他不是黨員，這絕對不能成爲不向他學習的理由。

從魯迅先生的黨性的表現上看，可以證明魯迅先生是用實際行動，並且從心底裏愛我們的黨的。他和我們黨之間的這種戰鬥的、同志的親密關係，自然也表現在他對我們個別青年同志的幫助和愛護上面。這種幫助和愛護，物質上的，精神上的，有時真可謂像對親兒子一樣。例子是很多的，不能詳舉。

在他最後十年中和我們黨的關係，還有他同我們黨的著名人物的接觸是應該提到的。一九三

○年夏天，李立三同志約他見面談過話，他們兩人討論過關於魯迅先生自己的戰鬥任務和方法問題。從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間，魯迅先生和瞿秋白同志之間所結成的友誼，已經成為著名的事件，人人都知道的了，我這裏無需再敘述。

我現在要略去一切，很想記下當談到一個偉人，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偉人，我們的毛主席的時候，他所表現的那種嚮往和親愛的神情。

魯迅先生沒有和我們毛主席見過面，也不會有過別的直接的個人的接觸。如果說通信，也就只有當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他和茅盾先生共同轉轉折折地送去過一個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慶祝勝利的電報。但是，魯迅先生的確是在關心我們的黨的；當長征勝利，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之下，將團結着全國人民以拯救日益危急的民族——這種遠大的勝利前景，一天比一天展開在眼前的時候，魯迅先生對我們黨和毛主席是抱着安心和感激的心情的。這是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大半時間在病中的時候，當他大略的知道了毛主席的天才領導和軍事上的戰略與戰術，而又談着這些的時候，他常常會默默地長久地微笑着；在這種時候，他的因病而略帶陰鬱的臉色就頓然變成爲異常的晴朗。我也曾經把我所記得的毛主席論他的作品的話告訴過他，他聽了，也是默默地微笑着的。

我記得有一天，他病比較好，精神也很開朗，在像上面所說的這類談話之後，他手上拿着紙烟，橫躺在床上休息了一會兒，又臉上微笑着從床上起來，在窗前的書桌前站着，半向坐在書桌旁邊的我，半向着窗子，一手橫在胸前托着另一隻拿着紙烟的手肘，只是那麼柔和地默默地微笑着，然後怡然自得地，又好像忘我地，平靜地說：『我想，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够任的，用

筆！」我想，他的這種心情，已經很够說明許多了。

因此，在那時，他在回答托派的信中，願意寫上他能够引我們的毛主席和共產黨員爲同志是自以爲光榮的一句說，也就不是偶然的。

記到這裏，我想到一個問題了，就是：魯迅先生的天才，越在晚年就越一步一步向高峯發展，這是不是與他和我們黨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這件事情也有關係？

我想到上文所記的魯迅先生在逝世前，當他談到我黨和毛主席之後，感到自己跟我黨和毛主席的親密關係，於是想到中國人民的偉大的勝利前途，就不知不覺地把自己引到一種柔和、怡然自得的、忘我的境地，平靜地說：「我做一個小兵是還勝任的，用筆！」——這種境地，我以爲正是魯迅先生的天才最高昇的境地！

因此，我以爲是有關係的。

黨給魯迅先生以力量！

魯迅先生緊緊地靠近我們的黨，腳踏在中國民族的土地上，而對着人民羣衆，全身心地，不顧一切地戰鬥着，於是他的天才發揮了，高高地上昇了。

離開了人民，任何天才都要枯竭的；離開了黨，也是任何天才都要走樣、停滯和枯竭的。依靠黨和人民，爲着黨和人民，奮不顧身地持久的戰鬥着，工作着，思想着，那就常人也能够成爲英雄，凡才也能够成爲天才。

我這樣地解釋魯迅先生，是因爲我這樣地相信；我也想努力學習，做到這樣。

我希望我自己和一切作家同志們，用我們學習和工作的努力來紀念黨誕生的日子。

這是中國的光明誕生的日子！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誕生的日子！也是人民的一切方面的天才誕生的日子！

一九五一年「七一」（黨三十歲生日）之前十四日記於北京。

魯迅和瞿秋白同志

徐 崧

訪問魯迅在上海的故居時，同時可以看見秋白同志的遺跡，除了幾處說明之外，還保存着秋白同志贈給魯迅的一面鏡子。

魯迅和秋白同志，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堅持文化戰線的鬥爭，這一段並肩作戰的歷史是非常重要的，可惜還沒有人加以採訪、整理，以補文學史著述的缺憾。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正是大革命退潮時期，革命的文藝陣營也陷於四分五裂。但在一九三〇年以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又團結起來，組成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此開始向反革命文化陣營的『新月派』和『民族主義文學』等展開了勝利的戰鬥。扭轉這個形勢的關鍵，應當說是秋白同志領導文化鬥爭所取得的成就。

魯迅自一九二七年從廣州移到上海，正如他的自述：「我是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他在上海又遭受到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攻擊。在文藝論戰中，魯迅說：「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的文藝論。……以糾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①

犯左傾幼稚病的人們，雖然站在革命方面來批評魯迅，但在批評中陷入了敵友不分的錯誤，